

内部刊物 注意保存

乐清党史资料

(第十二期)

中共乐清县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

一九八六年五月 日

目 录

当前的改革与党的历史的继承(转载).....	王首道	(1)
进城的回忆.....	钱云林	(9)
乐城解放前夕敌人撤逃的内幕与经过.....	谢妙香 邵汉领	(13)
城西区委及武工队活动的情况.....	万昌义	(21)
奔赴新的战斗岗位.....	芦 清	(28)
奉调浙南特委回忆.....	周夏杰	(30)

简 讯

我县落实地下党历史遗留问题的情况.....	县落实地下党办公室	(34)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编纂工作		
座谈会在京举行.....	转载《党史信息》第九期	(35)

当前的改革与党的历史的继承

王 首 道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进行的改革，是时代赋予中国共产党的新的历史使命，是一场历史性的转折。但是，改革中也自然包含着我们党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始终坚持的最本质的东西，包含着党的历史的继承——当然是发展中的继承。看到这一面，有助于我们用历史的观点加深对改革的整体理解，认清改革是党的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从而增强改革的自觉性。

当前的改革正是坚持我们党历来的目标：实现共产主义

建国前，我们党的历史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主要表现形式是武装斗争。这个武装斗争的过程是很长的，经历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四个阶段。我们党从建党开始走过了二十八年的历程，才推翻了“三座大山”，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取得了武装斗争的胜利，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由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建国以后，党领导人民经过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从创建时起，就确立了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那么，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依然是胸怀着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这个远大目标，是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动摇的。

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就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真理。同样，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然离不开党的领导，离不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于建国三十多年正反两方面经验的系统总结，就充分证明了我们的任何失误都是背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原则的结果，都是削弱或离开了党的正确领导的结果。

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且首先从改革农业开始，逐步推行了以家庭承包为主要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从而取得了今天这样好的形势。在农村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有利条件下，从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开始，我们又进行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小平同志把这场改革称之为“第二次革命”，足见其对于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意义。当前的改革是我们党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全部过程中的一个有历史意义的阶段，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有机组成部分。为了推动社会主义的发展和进步，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就是领导人民不断进行改革，不断进行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性质、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发展的和自我调整和完善。改革，不可能一次完结，不能企图毕其功于一役。今后，需要做各方面的努力。努力的事情，总是要归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逐步发展社会主义，为实现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到达共产主义，那还是要经过许多的改革，才能取得成功。

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我们看到当前的改革正是坚持我们党历来的目标：实现共产主义。因此，我们在改革中十分强调要有理想，要有纪律。

当前的改革体现了我们党历来的宗旨：一切为了人民

党的纲领和政策，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科学表现。过去搞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就是为了使广大人民群众摆脱剥削和压迫，翻身作主人。因此，一切为了革命战争的彻底胜利，这就是最大多数人民的最高、最长远的根本利益，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党的每一个具体行动也都是时时刻刻着眼于人民当前与长远的利益的。一切为了人民，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唯一的宗旨。还是在瑞金的时候，毛主席就指出，一面战争，一面搞建设，要关心人民的生活。所以才赢得了民心，才克服了困难，才战胜了敌人，才取得了全国的政权。

战争时代的一切为了人民的思想，在现在和今后，也都是我们党所一直坚持的根本指导思想，假如我们不是一切为了人民，只是为了个人，那还不是同过去的剥削阶级一样？还不是打倒一个皇帝又出一个新皇帝？中国经历了多少个朝代，只有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才领导人民在本土上消灭了剥削制度，实现了没有阶级剥削的社会主义制度。

当我们党在指导方针上出现失误，出现有损于人民利益的问题时，一经发现，总是不遗余力地纠正。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了高指标、瞎指挥、强迫命令、浮夸风和“共产风”，伤害了群众利益。不久，党中央、毛主席觉察到这些问题时，立即采取措施，加以纠正。只是由于没有从指导思想上来总结经验教训，影响了纠正“左”倾错误的深度。到“文化大革命”中，那更是犯了全局性的长时间“左”倾错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了过去的教训，决定从根本上纠正“左”倾错误，切切实实地把为了人民的利

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社会主义在消灭了剥削制度以后，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当前的改革，正是在为了人民的富裕这个最基本最现实的问题上展开的。在农村全面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生产迅速发展的好形势下，消除城市经济体制中妨碍生产力发展的种种弊端，挖掘城市经济的巨大潜力，推动整个国民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整个社会生产力发展了，人民的富裕程度就提高了。总结多年平均主义导致共同贫穷的教训，当前的改革，就是克服平均主义，认真贯彻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多劳能够多得，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一部分单位按照党的政策，依靠勤奋劳动先富起来，这是符合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必由之路，是一项基本国策。只有一部分“先富起来”，尔后才能有总体的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我们的最终着眼点。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搞活经济，实行开放政策，使大多数农民的生活得到了明显的改善。那么，工人、知识分子呢？他们的生活也要改善。现在，搞以城市为中心的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城市也实行责任制，城市搞得好的地方，工人、知识分子的生活也得到了改善。对中小学教师，党和国家也开始从各方面关心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改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生活都改善了，我们国家干部呢？当然也要改善，但是，必须是工人、农民先改善，干部后改善。这也可以称之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或者说是我们党历来倡导的：干部要“吃苦在先，享受在后”。为什么坚持这一条？这是革命战争时期的宝贵经验，这就是一切为了人民的具体体现。

一切为了人民，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容。过去武装斗争时期，人民是求生存、求温饱、求政治上翻身做主人。我们党领导人民争得了这个权利。社会主义时期，人民的根本要求是民富国强，依靠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生产的不断发展，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这是更高层次的要求。例如对文化生活的要求，就包括教育的普及和提高、科学技术知识的掌握和运用、业余时间精神生活的健康丰富等等。当前的改革，就是把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与革命战争时期相比，内容不同了，但宗旨还是一个：一切为了人民。

当前的改革也体现了我们党历来的原则：一切从国情出发

当前的改革，总要求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与我们党的历史上理论联系实际，从中国国情出发，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道路，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过去搞武装斗争，夺取政权，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正如毛主席所讲的，我们搞的“是中国式的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义”。任何事物都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中国革命是在人类历史上出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新时代的情况下进行的，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基本原理的指导的。然而，无个性即无共性。“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例如，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党中央高举起武装斗争的旗帜后，我们克服“左”倾盲动主义，改变了照抄外国革命以城市为中心的脱离中国实际的做法，从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封建大

国，革命力量有可能在反革命力量薄弱的农村得到恢复和发展的实际出发，深入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开始了我党第一次历史转折。这是“中国式”民主革命的特点。抗日战争中，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我们党为了抗日救亡，毅然同统治阶级实行联合，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在中外革命史上是没有先例的。抗日战争中，根据敌强我弱的历史现实和中国土地广大、乡村不依靠城市而自立、革命的基本力量是农民等国情，把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和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提到战略高度来看待，这也是“中国式”的，是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经验中找不到现成模式可套的。

建国以后，党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逐步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和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史上的伟大创举。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赎买政策，就是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和平赎买的设想应用于中国的实践，走了我们自己的路。

当然，在这方面我们也有反面的教训。例如，人民公社化这个制度，就是吃大锅饭，以为这样子可以很快地到达共产主义，实际是一种平均主义的空想。生产关系改变得过快，前进得过远，就大大离开了中国的国情，超出了生产力实际水平。后来，毛主席作了局部的纠正，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了生产队。但是，现在看来，原来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制度，仍然是吃大锅饭的办法，还是不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因此，这几年我们从国情出发，创造性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办法，具体体现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今年我们又废除了公社体制，恢复了乡村建制。这就打破了多年来“左”的僵化模

式，把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同中国农业实际结合起来，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农业道路。我到江苏等地参观，看到经济改革的形势确是喜人。实行责任制后，江苏各地水利工程建设得好，农业旱涝保收，许多地区粮食平均亩产达两千多斤。农业发展了，带来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化，腾出了更多的人来办工业。农村每个家庭有农有工，乡镇企业和大工业相结合，公路也修得很宽，交通便利，促进了城乡联成一体。各地还重视了发展第三产业。去年，江苏就有二十七个亿元乡。这就说明，从国情出发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其生机和活力真是估不透。

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历史证明：当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坚持“中国式”的时候，党的事业就发展，就前进；反之，违背了“中国式”的时候，党的事业就受挫折，就出现失误。因此，《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按照党历来要求的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按照正确对待外国经验的原则，进一步解放思想，走自己的路，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就是我们这次改革的基本任务。”

坚持一切从国情出发，还包括继承和发扬党的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等光荣传统。武装斗争时期，我们是靠艰苦奋斗英勇牺牲取得了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要看到经济建设起步晚、底子薄的国情，同样要提倡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绝不能因为现在是和平环境了，条件好了，生活改善了，就可以不讲艰苦奋斗了。大量的事实一再证明，无论是科学技术人员取得科研成果，工人群众进行生产改革和技术革新，农村社员广开门路劳动致富，都是日以继夜忘我劳动

的结果。当然我们历来所主张的艰苦奋斗，绝不同与极左思潮影响下那种大哄大嗡，大搞加班加点的形式主义，也不能把人民群众用正当劳动收入不断改善自己生活视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因此，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进而实现共产主义的过程中，一定要永远坚持党的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光荣革命传统。

（摘自《党史文汇》一九八五年第五期）

进 城 的 回 忆

钱 云 林

一九四九年五月九日（或许是十日上午），乐成党支部派人来报告，说国民党乐清县政府和驻乐成的敌军都逃跑了。当时我正参加了庆祝县民主政府成立大会，从雁西乡上马石村返回慎海。接到报告，即以加急信报告县委。县委很快来指示，命令我立即进城，任务是依靠乐成的党组织和革命青年，宣传党的政策，安定民心，并向国民党军政人员宣传政策，争取他们靠向我方。于是十日下午我就进城了。

和我一起进城的有万少华、陈祥林、王坚、林国祥、万显石。我们从东门进城，经居仁巷，先到民教馆西首的一所小学校里歇脚。时近傍晚，人们都没有注意我们这一行。小校学里没有人，静悄悄的。我通知家里送晚饭来，我的哥哥钱云琪送饭来了，我们几个人便在一个教室里吃晚饭。云琪把乐成党支部的成员徐赛劲、李纹、陈渭滨、郑启汉等请来了，我向他们传达了县委指示，大家商讨了一阵，他们就各自去向各人所领导的读书会、学习组的成员传达县委指示。

万少华、陈祥林、林国祥、万显石等当天晚上返回慎海去了，留下王坚和我作伴。当天晚上，郑启汉安排我和王坚住在高等小学里。

这里我插一插：一九四九年初春，县委书记叶龄银找我谈话，说县委建立了“城工组”，由叶和汤少林领导，县委分配我为城工组工

作人员，负责乐城的工作。我是不能进城的，因此县委指示虹桥区委安排我的生活和隐蔽处所。我担任城工组工作人员期间，经常和万少华、陈祥林、王坚等同志隐蔽在慎海、城南、盐盆等地，跟乐成党支部保持联系。慎海上叶村山上的一个岩洞、石公山上的一架小草棚、岭脚村一处伪装的稻草堆，常是我们宿夜之处。徐赛劲、李纹、渭陈滨、郑启汉等，经常秘密地出来跟我联系工作。李纹的堂弟李荣华，年仅十三、四岁，机警沉着，是我们的交通员之一，常为乐成党支部传递信件。九日那天送情报给我的，就是李荣华。

十一日，乐成镇人民纷纷传说共产党进城了，人心振奋。党支部发动了革命青年数十人，在逃亡地主洪式华的住宅中堂开会，我们决定成立“乐成人民革命工作队”，开展宣传工作。工作队就驻在洪的房子里。工作队通知国民党军政人员来开会，对他们宣传党的政策，交代他们保护各机关的公物和档案，听候接管。工作队派出人员到国民党各机关去，为接管作好准备。工作队的队长，先由我担任了几天，后来由郑启汉担任。工作队队员一天天增加，大部分是中小学教师，还有乐中和乐师的学生。他们编成好多支宣传队，白天练习宣传节目，晚上点了煤汽灯在乐成镇的大街小巷开群众会，进行宣传。宣传队用集体唱招引群众，然后向群众讲解我党的城市政策、对国民党军政人员的政策、朱总司令的渡江作战命令、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新华社电讯等等。工作队还出版《快讯》，摘要登载新华社电讯。

当时，百万雄师渡江南下，浙南游击纵队解放了温州，革命战争处于胜利的高潮，所以乐成人民革命工作队的活动，在乐成镇上造成了浩大的声势。乐成镇人心较为安定，商店照常营业，学校照常上

课，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在等待接管。只有少数潜伏的武装敌人常从城里溜到海上，又从海上潜回城里。我们有此情报，必须考虑对策。因那时在城里，只有我和王坚各人有一支短枪，对武装敌人的潜伏活动，我们警惕着，但又只得装聋作哑。我心里很着急，每天都派人去虹桥，催促县委、县府早日进城。

我最担心的是翁垟驻有一支一百六十多人的盐警部队。我担心他们来进犯，又担心他们下海溜跑了。我密托曾任商会会长的周启渭先生争取盐警起义，周先生答应了。我进城两三天之后，盐警派了两位代表来找我，我跟他们在洪岳滔住宅的东首门台楼上接谈。两位代表表示盐警部队要起义，询问我方的优待办法。我表示欢迎起义，我们将按政策给予优待，起义官兵愿留的我们欢迎，要去的我们欢送，发给遣散费，并保证安全遣散。第二天两位代表又来了，说他们的官兵都要求遣散。于是我们就讨论遣散费的数额。他们要求对军官要优待些，我同意，我和他们商定军官遣散费的数额。两位代表曾要求我们发给银元，我说银元有困难，我们发给稻谷，他们同意了。其实我那时连稻谷也未有着落。后来我和乐成党支部决定向镇上的殷户借粮，工作队为此忙了几天，才筹足供应发遣散费的稻谷。

我把和盐警谈判的情况报告县委，县委派陈权伍同志带领一批工作人员和县委警卫队一个小分队来城，由陈权伍领导接受盐警起义的工作。我和盐警的代表进行第三轮商谈，具体确定了我军去翁垟接受起义的日期，安全措施等。

五月中旬，县委派谷定文同志率县委警卫队从虹桥抵达县城，然后开赴翁垟接受盐警起义。这支盐警是两浙盐务管理局第七区队，队长贾山堂，所属有四十一队、四十二队、四十六队和游缉队，计有官

兵一百六十三人，配备有轻机枪，步枪等武器。我方具体办理接收工作的代表有：谷定文、吴震宇、叶昌斌和我。接收工作完毕之后，起义的盐警官兵集中县城，由我完成遣散工作。至此，乐清县境内陆上成建制的敌军，全部解除了武装。

五月二十六日，中共乐清县委、乐清县民主政府从虹桥移驻县城。那天，县城各界上千人列队在东门外，热烈欢迎县委、县府进城。县委书记兼县长叶龄银率县委、县府工作人员和警卫队全体指战员从东门进城，经东街，由十字街口转南街，在大操场，检阅前来欢迎的群众队伍，然后经北街，进驻县府。乐清人民的历史展开了新的一页。

一九八六年四月十九日

乐城解放前夕， 敌人撤逃的内幕与经过

谢妙香 邵汉领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顺利地渡过长江。二十二日，浙南地委发表《迎接解放军渡江南进》，号召浙南的党政军民“一致动员起来，以加倍的努力，向敌人展开全面进攻，坚决消灭浙南的一切蒋匪军，彻底摧毁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人民自己的民主政权。”四月三十日，第三支队全体指战员从鹤盛出发，奉命开往周岙集结，进兵温州。五月七日，国民党陆军200师师长叶芳举行起义，温州和平解放。五月八日，乐清县民主政府在雁西乡上马石村宣布成立。这一切，如同一颗颗重磅炸弹射向乐清敌人的营垒，造成大军压城城欲摧的强大革命声势，反动当局十分慌乱，个个焦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团团乱转。

应 变

五月七日下午，国民党乐清县副总队长丁昌周急急忙忙地从白象返回县城，随即去找陈济、卢文周、钱松年等几个亲信出谋划策，说：“我刚从白象回来，叶芳已叛变了，温州确已沦于共手。”

“温州已经沦陷，我们乐清是无力抵抗的，这该怎么办？”陈济等连忙问道。

丁昌周说：“据我所知，在台州、海门等地驻有国军，兵力雄厚，我们不如前去靠拢他们，同时还可以与省方联络。不过，这个计

划是要同县长商量的。”

于是，这班人就去找王辅臣。不等王辅臣开口，丁昌周就抢先问道：“王县长，温州消息你是否知道？”

这时，王辅臣虽然也想急于从他口中得知温州的真实消息，却又不好露出急迫的表情，只是说：“我已派主任秘书去温探听虚实了。”

丁昌周说：“不用再打听了，目前形势已很紧迫，得赶快想法撤退。”

王说：“慢一点撤退吧！等主任秘书胡宗王回来，再作计议。”接着又说：“即使要撤退，也必须请示省方。”

陈济、卢文周等立即插上去说：“请示省方，要等待何时？共产党来了，你是新来不久，在此地没有多大反共的事，可是我们不同呀，与共产党是势不两立的。如今，事已万分危急，不能再犹豫不决了，否则，我们就要把队伍带走。”

这班亡命之徒，自知对乐清人民血债累累，法网难逃，这时个个象惊弓之鸟。

丁昌周，浙江嵊县人，国民党中央第十四期黄埔军校毕业，曾任上饶集中营执法队队长，一九四三年后，浙江省保安处曾在仙居附近举办“干部训练班”，该丁担任过教官。一九四五年八月，省保安第二纵队司令裘时杰来永乐“清剿”时，丁被派往乐清“剿共”，任浙保第四总队第三大队长，一九四八年六月，浙保第四总队改称浙保第四团时，以其“反共”有功，提升为副团长兼第二营营长。是年冬，浙保四团长陈祖康调任缙云县长时，遗缺由副团长胡梦祥接任，该丁因得不到提拔，一气之下，便辞去了副团长职务，改任为乐

清县自卫总队副总队长。该丁在乐清的四、五年内，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革命同志和无辜群众惨遭杀害，血债累累，罄竹难书，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

陈济，乐清黄华人，一九三八年在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举办的山门抗日救亡干部学校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便自行脱党，一九四四年在担任伪黄曹乡乡长时，国民党八区专员派“肃奸”队来乐“清乡”时，被捕入狱，又办理了自新手续。同年十月间，乐清沦陷，该陈愤于家乡沦陷，与王鸣皋一起组建武装抗日，被国民党乐清县政府编为警备第四中队担任中队长，与我党合作抗日。一九四五年二月虹桥起义后不久，便叛变了革命，死心塌地投降了顽方，被编为自卫第三中队长，后提任为自卫大队长，充当了反动派反共的急先锋，并派亲信枪杀了与他共事多年的王鸣皋，我县不少的地下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他的双手沾满了革命烈士的鲜血。

王辅臣深感此时此地，实在是“强龙难压地头蛇”。虽然自己身兼自卫总队队长之职，但由于刚刚上任不久，人生地疏，兵权全在他们手里，众怒难犯，特别是在这个局势动荡之际，不好触怒这班手握实权的人。于是就答应道：“好吧，那就定明天召开紧急应变会议。

次日，在伪县政府的大院里，只见一排排武装人员荷枪实弹，戒备森严，从大门口到会议室四周布满了一道道岗哨，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参加会议的党政军头目，有自卫副总队长丁昌周、自卫大队长陈济、警察局长王岗南，特务秘书陈晓庐，参议会参议长朱亦明、县党部书记长叶××（未到）、电台台长胡方朔、情报组长钱松年、城区联防队队长卢文周等等。王辅臣首先讲了话。他说：“自从共军渡

过长江后，形势出人意料的急转直下，目前温州已落于共军之手，我们此地将无法抗拒，只得撤离乐清，向海门方向去，靠拢省方。我本是一县之主，守土有责，在未得省方允许前，是不能擅离职守的。但这次撤退举动，都是你们的意思，将来省方如果追究责任，还要请朱议长及各位做个证明。”到会的人员都异口同声地说：“可以，可以。”

紧接着，就由王辅臣宣布撤退命令：

一、所属各自卫队、联防队和警察队统统集中虹桥待命，向海门方向推进，由副总队长丁昌周统一指挥。；

二、县自卫大队，由大队长陈济指挥，城区联防队由中队长卢文周指挥。警察队由警察局长王岗南指挥，无线电台由台长胡方朔指挥；

三、西乡联防队由队长郑辉指挥，并布置好撤退后的联络工作。

以上各队伍统于五月十日前到达虹桥待命。

四、虹桥联防大队由大队长翁碧如指挥，于五月十日前，在虹桥就地待命，并布置好撤退后的联络工作；

五、城区撤退后的联络工作，暂由朱亦明与陈晓庐待候主任秘书（去温未返）商量布置。

六、行政人员除指定留待移交外，其余一律解散。

当宣布到第六项命令时，会场当时议论纷纷，说：我们撤退了，还管它什么移交不移交。

夜晚，王辅臣即把这个撤退计划电告柳市郑辉（白天未到会）。可是这个称霸一方的反共头目，另有他自己的如意算盘。他不同意向海门方向撤退，主张从石马、柳市沿海一带就近下海，占领大门山

和黄大岙诸岛屿，以便伺机反攻大陆。他还说：“到海门方向去，既要经过长途跋涉的劳苦，又必须经过芙蓉、白溪、大荆等山区，而那一带正是三五支队经常出没的地方，易遭阻击；就近下海，这正是应变的上策。这番话说得王辅臣无言可答，连连称是。至深夜，王还通知白天未到会的县党部书记长叶××来县政府商谈撤退计划，并决定改变原定的撤退路线，密令卢文周于次日凌晨率部前往石马港一带征集下海船只。

撤 逃

九日上午，郑辉从柳市慌慌张张地赶到乐城，这一群临逃前的反动军界头目，就撤退方向路线问题又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吵，丁昌周、陈济等人仍认为往柳市方向去决不是好办法，只有向虹桥去，才是出路。但他们知道郑辉是个炮筒子脾气，把他的火气激起来难以收场；又屈服于他的实力，同时该郑还得到了王辅臣的支持，只得作罢。但在往石马撤退的路上，仍然各持己见，王辅臣、郑辉走在前头，丁、陈在后面跟着走，一边走，一边争论不休。

郑辉，柳市长山人，出身伪军校，一九四四年回乡，推为“乡民代表会主席”。一九四五年参加国民党活动，被选为县党部监察委员；一九四六年办“乐清新报”，企图控制舆论阵地；一九四七年十月，国民党县保警第一中队刘杰部在白石被我缴枪后，立即在西乡的象峰、柳市等三乡为首组织联防队，后为柳市区联防委员会主任，疯狂地进行反共活动，我县早期的优秀共产党员钱国安等就惨遭其杀害的。因其“剿共”有功，曾被反动当局通令嘉奖，一九四八年夏，被提任为县联防委员会主任，兼永乐边区联防指挥部主任。他霸据一

方、横行乡里，招兵买马，扩充势力，敲杠勒索、中饱私囊，柳市人民怨声载道，叫苦连天。他的下颊有须，通称“羊牯”，说话时往往高声大喊，又称之为“大炮”。连这些反动头目也都忌他三分。

这天，东方还没有发白，卢文周就带领联防队队员来到石马沿海一带，征集下海船只。可是从早上到下午奔走了一天，毫无收获，只得向王辅臣汇报。王辅臣见天色已不早了，又找不到下海船只，就下令各队伍速速返回乐城再议。这时，丁昌周就对王辅臣存有戒心。并要陈济、钱松年、卢文周等派人暗中监视，说王辅臣这个人反复无常，居心莫测，要严防他步叶芳的后尘。

当这些鸟合之众离开石马后不久，伪温州行署专员兼保安司令周琦乘温州和平解放的混乱之际，乔装打扮，只身逃到乐清，在经过石马时，被卢文周的步哨查获。周琦说明自己身份后，即由卢文周亲自陪同他到了县城，与王辅臣等一班人见面，各诉苦衷。原来周琦系国民党浙江省省长周密的哥哥，王辅臣原系第七区保安副司令，都是四九年四月间新上任的。那时，国民党浙江省反动当局认为时局吃紧，为了战时应变需要，把一些战略要地的文职官员都调了，换上军人出身的亲信来充任。

十日早晨，丁昌周、陈济这一帮人不听王辅臣的指挥，就把队伍拉到虹桥去，王没有办法，只得跟着他们一起走。在虹桥和翁碧如的联防大队汇合。

翁碧如，虹桥四都人。原系“市井无赖，凶悍成性”。一九四二年三月充任顽四都乡乡长，因办理兵役，滥捕群众，贪赃枉法，我地下党组织发动士绅、群众向省保安处战区军风纪第一巡察团和八区专员控告，该翁怀恨在心，于一九四三年三月密谋杀害我地下党员万国

康。告发后，被国民党地方法院判处死刑，关押温州；一九四四年九月，温州沦陷前夕，曾迁牢监于枫林。嗣后，日本侵略军侵占枫林，被释放出狱，充当汉奸，得款数十万元，不久即脱逃到省保安处人事科长翁启蒙处，改名翁建树，被充任为浙保四团迫击炮连长，又进驻虹桥四都一带，耀武扬威，群众遭其荼毒杀害、敲杠勒索较前尤甚。此事复经告发，该翁又潜逃在外。一九四八年，经伪县长陈诚、丁昌周、陈济等邀请，出任虹桥联防大队长。虹桥人民无不切齿痛恨。

当日晚上，他们又在虹桥开了一次会议，商量撤退的路线，决定经芙蓉，过白溪、大荆，到海门。可是王辅臣提出说：“我已打电报给省方，未见复示。请你们给我两个中队，带回乐城去，我是守土有责的。”大家听了这话后，对王辅臣更加疑心，说他派主任秘书到温州去，不是探听消息，而是为了联络“叛变”，走叶芳的道路，对他防范更严。

整 编

十二日上午到了大荆，周琦亲自打电报与国民党浙江省反动当局联系，没多久就联系上了。命令他们在温岭、黄岩一带集结待命，并将这些乌合之众进行整编，一一加以封官，委派周琦为浙南行署主任，队伍改编为浙南行署特务团，团长丁昌周、副团长陈济、郑辉、政工室主任由郑辉兼任，钱松年为副主任；副官室主任叶正熙，军需室主任卢超、书记室主任赵廷弼，电讯队长胡方朔，特务连连长卢文周。下设四个大队，共计官兵一千左右。驻扎在大荆期间，丁昌周指挥他的暴徒，捣毁中学校舍，抢夺学生群众食谷。

夺印

十四日到达温岭的大溪。

十五日上午，丁昌周、陈济、郑辉、卢文周、钱松年等一些亡命之徒就密谋策划，以制止王辅臣的“叛变”为藉口，强迫交出伪县长印鉴，并逼其缴出随带的加拿大冲锋枪，王被威逼得直瞪脚，说：

“我王某一向效忠党国，决无三心二意，想不到今天会被你们诬陷到如此地步……好吧！告辞了。他说完，带着三、四个徒手卫兵，转身就走了。

王辅臣一走，周琦就委任丁昌周兼任乐清伪县长之职。

十六日，他们到达温岭县的泽国，计划在此地固守。这时，周琦对他们说：“省府今已迁往舟山，我必须亲去联系一趟。你们暂在此待命，下一步如何行动，我将会通知你们的。周说完后就走掉。接着，他们与驻在海门的浙保副司令王云沛取得了联系，归王云沛统一指挥。

廿七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浙南游击纵队，第三支队在支队长周丕振的率领下，攻打温岭县城，王云沛立即命令丁昌周率部前去增援，当丁率部到达中途时，得知县城已被我军解放，即行撤回，第二天，王云沛见情形万分危急，立即电促丁昌周率部前往海门，一同从海门乘船下海逃走了。

（根据有关资料整理）

城西区委及武工队活动情况

万 昌 义

一九四八年八月，括苍中心县委决定撤消梅溪区的建制，成立城西区。将原梅溪区的四都、五权二乡及淡溪乡一部分划归虹桥区委领导，淡溪乡的大部分（即今稠坪乡）划归山面区委领导，其余地区及党组织统归城西区委领导。当时城西区的管辖范围比较大，有乐清县的城北和永嘉县的陡门、峙口、沙头、青岩、仁浦、七都、罗溪等乡，还有柳市区的部份乡村，我们可以活动的共有二十二个乡镇。原梅溪区委书记梅迪民同志调县委另外分配工作，城西区委书记由我担任，领导成员有常委黄杰、黄志卿，执委陈立业、邵加南。

在城西区委建立的同时，乐清县委派邵加南带领十余名武装骨干来组建城西区委武工队，邵加南为队长，林加熙为副队长。武工队初建时的主要骨干有连士安、陈岩成、胡圣荣、杨春、林春、陈洪喜、严仁美以及文教施永林、胡岳标等。武器的配备（包括区委机关在内）有木壳枪两支、手枪一支、枪榴弹筒一支、步枪十多支。

区委分工，我负责区委机关，并同邵加南一起带领武工队在永嘉、乐清边界地区打游击，以永嘉县的高山、绍山一带为基本活动区，并逐步向西南山区的青岩、东樟、西叶等地以至瓯江北岸开辟新区。

黄杰同志负责柳市地区，同地区干部黄玉鸣、陈加熙一起在柳市平原开展地下工作。当时柳市镇驻有国民党郑辉所部的联防大队，白

象、琯头驻有国民党屠志勇部队，反共活动甚为猖獗。自郑集华同志牺牲后，敌人经常向我红色地区包围搜剿，武装镇压更为恐怖。我们有些支部遭破坏，有些支部同志为避免敌人清剿离开本地，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城西区委团结党员和革命群众，艰苦地坚持斗争，开展工作。

黄志卿同志负责城北、陡门、峙口一带游击区，同地区干部陈永光、黄国侯、陈益等在一起，依靠地方党支部，发动群众建立农会和民兵组织，开展抗丁、抗粮和减租、减息斗争，做好支援部队等工作。这一带游击区的大多数党支部都是在一九四六年和一九四七年期间由黄乐平、黄杰、黄志卿等同志发展起来的，经过多次的反清乡斗争考验，大多数同志对敌斗争都非常坚决。

陈立业同志负责开辟新区，他和地区干部余益寿一起，以东樟、西叶为基点，在武工队的配合下，在东岸乡及罗溪地区发展党组织。这一带党的基础较薄弱，群众尚未觉悟，开辟新区的任务自然是十分繁重的。

区委和广大党员艰苦工作，到一九四九年初，我们的工作有了很大的进展。新支部不断建立，并在城北、陡门、峙口一带游击区普遍地建立起农会和民兵组织。由于各地党组织力量不断壮大，农会和民兵组织的普遍建立，加之武工队的广泛活动，使国民党乡公所及其保甲组织基本瓦解。我们的村农会代替了村政权，如办学校等地方公益事业都由农会出面办理，峙口乡的群众要求我们派知识青年去当小学教师，我们就派出了林亢中、余孝安、黄天成去陡门、大寮山、樟岙等地当小学教师，并在那里开展群众工作。我们逐渐赢得了群众的积极拥护。比如一九四八年秋收后，我们在峙口、陡门、城北等地征收公

粮，群众踊跃交纳，一下子收了五万多斤。

区委武工队扩大了。当时有永嘉乌牛村的徐培根、西叶村的孙龙春、金坑村的刘洪涛、柳市区的蔡旺发、黄宝维、黄希宗、陈宣琴、黄顺者、余文斌、钱龙泮、钱荣华等二十多位青年参加了武工队。武工队迅速发展到四十多人，成立了四个班。第一班班长林加熙（兼），第二班班长胡圣荣，第三班班长严仁美，短枪班班长陈岩成。武工队的武器装备，一部份是县委警卫队和支队第四中队发下的，一部份是我们向国民党乡公所和反动地主收缴的。

武工队战士大多是青年党员和工农积极分子，政治觉悟高，革命意志坚定，对敌斗争勇敢。我们对战士的军训和文化学习也抓得很紧，每天上午有一个半小时出操军训，下午有一小时学文化。文体活动也很活跃，有唱歌、打排球、猜谜语、做游戏等。战士们心情舒畅，紧张又活泼。每周还有生活检讨会和军人大会。同志们都有较强的组织性纪律性，能密切联系群众，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积极为群众做好事，深受群众的欢迎。

当时我们几个领导人员工作很紧张，好多事情都经常在夜里处理。武工队几乎每天行军转移，环境好的时候，一处宿营地最多也不超过住两天。每当转移到一处新住地，我就和邵加南、林加熙一起先观察一下地形，然后确定步哨位置，商定口令，接着要找当地支部和群众了解情况等等。待战士和干部都睡静了，几个领导人就坐下来写信，同交通站取得联系。将这些事情都处理好以后，常常是下半夜了。当时大家都年轻力壮，也不感到怎样疲劳。

一九四九年初，武工队转到永嘉的青塘、东樟、西叶一带活动，配合陈立业同志开辟新区。这时我们经常召开群众大会，宣传解放战

争的大好形势和光明前途，宣传共产党游击队为劳动人民解放而奋斗的革命道理。陈立业、邵加南、施永林和我轮流向群众作形势和政策报告。经过我们的宣传，广大群众有了觉悟，和我们的同志亲如骨肉。

我们的武工队既是宣传队、工作队，又是战斗队。我们坚持在永乐边界山区活动，主动出击，牵制了乐城、柳市、白象及永嘉沙头的国民党驻军，使他们处在被动的防御状态。一九四九年二月间，武工队曾先后两次在黑夜深入乐城镇后山，开枪射击国民党县政府，扰乱敌人，鼓舞人民。

二月间，我们根据永嘉县乌牛村党支部书记徐岩銮的报告：灵昆乡乡长家里有收发报机一架、木壳枪一支，乡公所内驻有国民党联防队。我们决定带武工队去缴枪。灵昆乡是瓯江口的一个小岛，我们根据乌牛党支部同志的介绍，把灵昆岛的海思、双官、单官三个埠头，及乡公所和乡长住宅的地理位置，画了一张草图。根据草图，我们进行研究。如果白天穿便衣进去，目标太大；若是夜里进去，人地生疏，难以完成任务。最后我们想了个办法，化装成国民党部队，白天进去，我们存有不久前缴获的国民党水警队制服二十多套。主意一定，我们就抽出各班班长及武工队骨干二十多人，组成战斗队，由我和邵加南、施永林化妆成国民党军官，陈岩成、施立川化妆成勤务兵，其余同志都化妆成水警队士兵。登上灵昆岛，我们在乡长家里缴来一支左轮手枪和一架发报机。在乡公所也顺利地缴来了联防队的步枪数支。

一九四九年三月底的一天，我们收到县委的急信，说支队部决定歼灭国民党枫林驻军，估计国民党驻虹桥浙保独立团可能会经过我区往枫林增援，命令我武工队立即行动，牵制虹桥增援之敌。我们决

定抽调各班长和骨干组成两个战斗组，由我和邵加南各带一个组，埋伏在朱埭岭，准备阻击敌军。我又马上写信给虹桥区地工人员，要他们加强注意虹桥敌军的动态。并通知四都丁岙支部，如虹桥敌军经过丁岙开向朱埭岭，应派出民兵阻击，拖住敌军。

上午，我收到周天一送来的情报，说敌虹桥朱哲光部队就要开走了，虹桥镇内商店里的电筒、电池都被买光了，还抓了一些民伕。我得知这一些消息，估料敌军肯定要增援枫林了。于是就和加南一起把炊事班及非战斗人员留在西坳独座茅屋内，将战斗组带到朱埭岭迎敌。我们选择在一段踞高临下的有利地形埋伏下来。下午一点多，敌军进入丁岙，向朱埭岭上开来了。敌离我们约有一百多米时，战士陈宣琴就首先开了枪，我武工队即猛烈射击。敌兵落荒而逃，把背包、洋铁碗、担架都扔掉了。敌军有三百多人，又有机枪。我们不到三十人，只有十多支步枪。我们就将战斗组分两路游击。那天正好阴雨，云雾弥漫，敌人看不到我们，而我们却在密密的树林里能隐隐约约地看到山岭上爬行的敌军。此时，丁岙村支部杨松琴和虹桥区干部带领民兵在岭下开枪了。敌军怕遭我们的夹击，小心翼翼，走走停停。当敌军起步走的时候，我们就开枪射击，敌军停下不走了，我们也停下不打。就这样，迫使敌人象乌龟似的爬行，等他们走到陡门的时候，已是下午五时多了。

傍晚，我们武工队集中在西坳独座茅屋里休息，同志们烧起柴火烘干衣服。这里离陡门只有一里多。晚饭后，陡门村党支部同志跑来报告说，敌人团部就住在陡门靠后山附近的保长家里。根据报告，我们采取敌疲我打，敌驻我扰的办法，又带领战斗小组到陡门袭击敌军。九点多，我们由陡门村支部同志带路，冒着小雨从陡门村后山的

小路一步步地摸下去，对准敌军团部驻地的保长房子开枪射击，林加熙还打了几个枪榴弹。敌人开枪回击，还用六〇炮轰我们。因为黑夜阴雨，敌人看不清我们，冲又不敢，打又打不准，进退无计。我们扰乱了一阵之后，马上返回西坳。

第二天早晨，雨停了，我们在陡门后山背上观察敌军。敌人在吃过早饭后整队出发，但只走过陡门前面的小溪坑就停下不走了。据此，我们估计敌军已得知枫林战斗结束的消息。他们停留了一会之后，就向潘垟方向开走了。

这次我们武工队以不到三十人的兵力阻击三百多敌人，达到了牵制敌军的目的，配合支队部胜利地完成了歼灭枫林驻敌的任务，受到了县委和支队部的表扬。

一九四九年四月初，乐清县委警卫队队长陈兴荣在虹桥战斗中受重伤牺牲，县委决定调邵加南回县委担任警卫队队长，任林加熙为城西区武工队队长。

一九四九年四月下旬，武工队又增加了十几名队员，有白石徐柏龄、许玉赞、钱岩荣，东岙蔡岩良、余文安，峙口河岙郑介清等，编成一个新的班，由蔡旺发任班长。这时，县委决定把武工队扩编为区中队，调林加熙到第三支队，任周兴为区中队队长，区中队下设五个班，共有六十余人枪。

这时，地区工作又有了较大的发展，新区不断开辟扩大，新支部不断建立，据统计，当时全区共有党支部八十余个，全区脱产人员包括武工队在内共有六十多人，全部生活费用都由本区自行解决。除自给外，我们还有相当一部份经费上交县委机关。

一九四九年四月底，县委决定撤消城西区建制，成立柳市区委和

区政府，同时调黄杰去第三支队第六中队任中队长，又调陈少东任柳市区委副书记。增补周兴为区委执委，我仍任区委书记兼区长。四月十二日在乌牛召开柳市区委和区政府成立大会。接着，我们一面着手村政权的建设工作，一面开展更大规模的支前运动和肃清残余匪特的斗争，迎接大军南下解放全国。

奔赴新的战斗岗位

卢清

一九四七年底，括苍中心县委奉命上调浙南特委一个分队。这个分队有二十余人组成，人员是从中心县委警卫队、海上第三中队及各区武工队中抽调来的，抽调来的人员都是部队的骨干份子。这分队由我任分队长，一班班长由我兼任，副班长朱振好；二班班长张达芳，副班长孔宪柳。武器装备有：木壳枪四支、轻机枪二挺、枪榴弹筒两个、步枪十四支、子弹二千余发。

分队组成后，中心县委领导人组织我们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邱清华、周丕振同志交代我们上调特委的任务，并嘱咐一定要安全到达特委机关。因为潘田波同志是英勇机智的出色军事干部，又很熟悉由括苍去特委机关的路线，所以中心县委决定由潘田波带我们去，潘田波完成带队任务之后是要返回括苍的。县委指示，由潘田波、卢清、张达芳组成临时党支部，潘任支部书记。这个党支部是指挥我们完成上调任务的领导核心。

出发的那天，周丕振同志在讲话结束后，把自己佩带的一支崭新的木壳枪卸下来交给我，说：“这支枪是我自己用的，现在交给你用。”这时，我的心情甚为激动，双手捧过周同志亲手交给的木壳枪，我说：“我们一定完成中心县委交给的光荣任务！”当时中心县委正在开扩大会议，与会的同志为了鼓励我们，都在我们的笔记本上题词签名留念。最使我难忘的是林存邦同志的题词，他写道：“南征

是艰苦的，任务是光荣的，共产党员务必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林存邦同志是我括苍武装部队的优秀军事干部，他平时关心同志，经常教育和鼓励我们前进，我多次从他的言行中得到启发和提高。一九四九年春，闻讯他在虹桥战斗中壮烈牺牲了，很是悲痛。林存邦同志的崇高形象至今一直活在我的心中。

我们于一九四八年一月由中心县委驻地山面乡泽基村出发，随中心县委机关到永嘉县的蓬溪村，徐寿考同志带领我们经过永嘉黄山地区，我们与永仙边武工队协作，做些开辟游击区的工作。这时，敌永嘉自卫团有一个营尾追我们，他们在黄山一带杀人放火、强奸抢劫。分队的同志恨极了，准备揍他们一下，等我们摆了阵势，他们跑了。当我们到达永嘉小岭村时，遇上敌人两个连的拦截。我们抢占了小岭村前面的制高点，集中火力痛击敌人。敌我激战了一个多小时，我们打退了敌军几次冲锋。傍晚时分，我们撤出战斗。大概敌人也不知我方虚实，且小岭一带是我老游击区，他们不敢恋战，也撤走了。

我们行军的时候，正是一九四八年一月下旬至二月上旬，同志们在丛山峻岭上攀登。深山里白雪皑皑，寒风刺骨。夜间，我们借着雪光，在悬崖峭壁之上匍匐前进。二月上旬，我们行进在青田县境内，渡过瓯江，到达瑞（安）青（田）边境，在曾绍文同志领导的地区休息了几天。我们按预定计划于二月中旬安全到达特委机关，受到特委领导同志的热烈欢迎，我们被编入特委机关警卫队。

一九八五年三月

奉调浙南特委的回忆

周夏杰

一九四八年，我在括苍中心县委机关担任机关警卫队队长。那时，括苍中心县委机关和括苍支队部一起行动，中心县委书记邱清华兼任支队政委，支队长是周丕振。我们警卫队的任务是保卫机关和首长的安全。

八月，中心县委接到浙南特委的指示，要抽调一个连的兵力去加强特委机关的武装。那时，括苍支队有四个中队和一个独立分队，县委和支队的首长们坚决执行特委指示，决定抽调优秀的指战员和最好的武器，上调特委，并决定由我负责带这个连前去。周支队长和邱政委找我谈话，征求我的意见，我感到这是首长对我的信任，当即接受任务；当时，当我想到将要离开自己斗争多年的老游击区和跟随多年的老首长及相处多年的战友，还有游击区亲爱的乡亲，惜别之情难于抑制，不觉暗暗地流下眼泪。

一个星期后，各个中队被选的同志陆续报到。一中抽调一个班，章加魁任班长，章三梅任副班长；三中抽调一个班，林达极任班长，张小极任副班长；四中抽调一个班，梅孔荣任班长，叶章才任副班长，独立分队抽调一个班，龚德洁任班长，徐定叙任副班长。每班都配足十二个人。人员到齐之后，邱、周二位首长亲自接待。周同志还对每一件武器，都一一作了检查。当时，我佩带的是一支二十响的双龙眼木壳，因为我是警卫队长，这支木壳枪是全支队最好的一支，我

要卸下来交给首长，换一支较差的，但被二位首长阻止了。邱同志说：你们去保卫特委机关，正需要把最好的武器带去。周同志还从自己身上卸下一支他平时使用的，也是他最喜爱的那支木壳枪交给战士周丕旺，要他带去上交特委。邱同志还到各班动员，交代任务，他说：你们上调特委机关是一个光荣的任务。到达之后，一定要服从指挥，加强组织性和纪律性，练好本领，多打胜仗，消灭敌人，为解放全浙南和实现全国解放而努力奋斗。

八月中旬，我们的上调连正式编成。我任连长，陈清和任政治指导员。全连编制四个班，每个班十二人，配四个文化教员，还有四个炊事员。连部设连长、政指和通讯员三人，随同去的还有警卫员一名。全连共六十多人。武器配有轻机枪二挺、木壳枪三支、冲锋枪一支、步枪四十八支，每支枪的弹药均配足。我们连的武器装备与当时其它各个中队比较，确是最好的了。这对我们几个领导人来说，真是莫大的鼓舞。我们也感到责任重大，更增加了前进的勇气。

我们动身之前，在大舟山村，支队首长与我们全连同志合影留念。这张照片现在还保存在北京中国军事博物馆第四馆展出，它给我们浙南革命史锦上添花。在隘峙村，中心县委机关和支队部又为我们举行了欢送大会，支队文工团为我们演出了许多精彩的文艺节目。在欢送会上，邱、周二位首长又给我们作了指示。第二天，我们就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我们的首长和同志，及老区的父老兄弟姊妹们。八月底，我们从永嘉出发，经过樟田庵、谷锦岙、业陈坑、廿四寮、桥下街，在青田县的四埭石村渡过瓯江，经藤桥、廊溪，然后到达瑞安，行程上千里，走了将近一个月时间，按时到达瑞安县梅山村特委机关。行军途中，我们认真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沿途群众都很热

情地欢迎和接待我们。当时支队部特为我们每人缝制了一套崭新的衣服，还配了一顶藤制的盔帽，群众见到穿戴这样整齐的子弟兵，更加高兴，主动积极地帮助我们买菜、买米、送稻草、送铺板、送情报、放暗哨、当向导。当我们到达青田县茹溪边的山村四埭石时，因该村早年深受红十三军活动的影响，加上吴毓、吴荣膺二同志也在那里做过地下工作，群众基础很好。村民们见到我们这支队伍，特别高兴。他们说，已有几十年没有见到自己的部队了。他们送了许多柿饼、花生来慰劳我们。我们借此机会召开了群众座谈会，进行宣传教育，并向他们表示感谢。

部队一路上翻山越岭，行军很艰苦。战士们草鞋穿破了几双，饱一餐饿一餐，常吃地瓜干、青菜梗，但全体同志始终情绪高昂、精神饱满。我们深深感到，由于括苍支队一向重视思想建设，我们这个新编的连队才能如此坚苦顽强。到达特委机关以后，我们更加重视连队的政治思想建设，政治课、文化课和军事训练都抓得很紧。政指陈清和亲自上政治课，文化指导员杨谋、教员陈法文、金如连等工作都很认真，连队的政治素质和军事技术都提高较快。

大约在十一月初，特委书记兼纵队司令员龙跃同志及纵队首长程美兴、余龙贵等同志来到我们连队的营地视察，龙跃同志给我们讲了话。特委机关还特为我们举行了晚会，接待非常热情，使我们大受鼓舞。

一九四九年四月，特委领导为准备解放全浙南，对所属部队作了一次新调整。一支队集中在瑞安县竹岙镇，我们连编为第三大队，我任大队长，陈清和任教导员，下辖三个中队，还有通讯班和机炮排。七中队长郑生，政指张加浜，副中队长龚德洁；八中队长兼

政指张子元，副中队长夏朝贵；九中队长苏定居，政指张宏熊。

六月，渡江南下的解放大军廿一军与浙南纵队会师，我们三大队编为卅五军一〇五师三一〇团三营，我仍任营长，陈清和任教导员。我们营新增加了一个炮兵连。原来我们上调连的许多同志提升为班、排、连干部。这个连队在每次战斗中都担任主攻任务。例如，平阳鳌江一次战斗，敌人一个营全是美式装备，又是正面作战，被我们消灭了；在温岭北江山海岛战斗中，一连担任主攻，战斗结束，被评为先进连；在解放福鼎县及在南麂、北麂、台州等地剿匪的战斗中，我连均为主力，英勇善战。

三十多年过去了，回忆当年和我一起战斗与生活的同志们，记忆犹新。解放后，老同志们分散在全国各地各条战线上，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骨干分子。我们这批人之所以能对祖国和人民作出一点贡献，应归功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应归功于浙南特委和括苍中心县委的培育。现在我们都上了年纪了，希望同志们常盛不衰，永葆青春，为实现祖国四化建设的伟大目标，继续努力。

简讯：

我县落实地下党历史遗留问题情况

一九八五年，乐清县委根据中央、省、市有关落实地下党历史遗留问题的指示精神，建立了领导小组，由县委副书记薛振安任组长，孙龙春为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各区乡镇都相应地建立工作班子，抽调力量，对我县地下党历史遗留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复查，平反纠正了一批冤假错案。据统计，全县应复查处理的地下党员 2050人，到一九八五年底止，已复查处理1994人，占应复查处理数的 97%。其中恢复党籍 912人，党龄连续计算的148人，维持不变的907人。需提交法院审理的有 66件，经审理后宣告无罪的有 15件，部分改判的 2件，不追究刑事责任的 6件，其他三件，还有一部分维持原判。对一些平反、纠正了冤假错案的老同志，县委按照党的政策，区别不同情况，对他们的生活安置等善后工作，分别作了妥善处理，计恢复工作的 6人，改办离休手续的 22人，改办退休的 12人，作退职处理的 25人，定期补贴的 104人，同时还给一部分农村老党员生活确有困难的予以适当补助(包括一部分不予恢复党籍的。)通过复查，调动了大批人的积极性，增强了团结，促进了“两个文明”建设。许多蒙受冤屈的老同志，现在政策落实了，心情舒畅了，他们一家人、亲戚都很感激，有的热泪盈眶，纷纷写信或口头赞扬我们党的英明伟大，公公正正地为他们平反、纠正了冤假错案，并表示决心为四化建设作出贡献，以实际行动报答党的恩情。

(乐清县地党办供稿)

简讯：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编纂 工作座谈会在京举行

由中央党史资料征委会、中央组织部和中央档案馆三家主持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编纂工作座谈会于三月二十七日至三十一日在北京举行。到会的有来自全国廿九个省、区、市的有关负责同志约 130 人。这次座谈会的主要任务是在征集、整理、编纂方面统一思想和要求。

二十九日下午，习仲勋、邓力群、郝建秀等中央领导同志和中组部的新老部长亲切接见了参加会议的全体同志。习仲勋同志说：编纂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是一件大事，是一件好事，是一个大的工程，要抓好，要搞准确，要分工合作，把这项工作做好。

会议期间，中央党史资料征委会主任冯文彬、中顾委委员李锐、中央档案馆馆长王明哲分别作了报告和讲话，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编纂的重要性和严肃性，征集、整理和编纂的途径和方法等问题进行了论证，提出了要求。

中央党史资料征委会副主任马石江在大会结束时作了总结发言。

会上确定征集、整理和编纂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的任务在一九九〇年完成。要把这一工作纳入党史资料征集系统、党的组织部门和

档案系统在“七五”期间共同承担和必须完成的重点项目。座谈会同时议定，不仅中央要编纂党的组织史资料，而且省、地、县三级也要编纂各自的组织史资料，按照这一“四级”编纂的方案，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将形成一座金字塔型的数以千卷计的资料库。金字塔的基座是两千多卷县一级的组织史资料、第二层是二百多卷地（市）一级的组织史资料，第三层是二十九卷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组织史资料，顶层是中央组织史资料编辑组编纂的组织史资料。

会上还确定了将“广征、核准、精编”作为征集、整理、编纂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的基本工作方针。与会同志一致认为：要做好党的组织史资料征集、整理和编纂工作，必须在党委的领导下进行，同时，必须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和高度的责任感来完成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转载党史信息报第九期）